

蘇維埃新貴們 是如何生活的

赫·史密斯等著·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蘇維埃新貴們 是如何生活的

赫·史密斯等著

**蘇維埃新貴們
是如何生活的**

赫·史密斯等著

出版者：香港朝陽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定 價：港幣二元七角

一九七六年八月初版

目 錄

兩極分化的蘇聯社會

兩極分化日趨嚴重	西班牙《消息報》 法爾加斯	3
特權階層的棲息之所	英國《金融時報》	7
在俄國一些人勝過另一些人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駐莫斯科分社社長 詹姆斯·華萊士	10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		
……美國《大西洋》雜誌 赫·史密斯	13	

貪污、舞弊、走後門

爹媽利用職權“打贏了官司”……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采科夫	39	
在櫃台的那一邊	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43
大路上的受賄者	蘇聯《東方曙光報》 伊諾維利	46
羊毛出在羊身上	蘇聯《東方曙光報》特派記者 弗里德曼	49

腐朽的社會生活

在莫斯科的六年	日本《產經新聞》駐莫斯科記者 熊田全宏	55
蘇聯式的“富裕社會”		
……日本《東京新聞》前駐莫斯科記者 高橋正	61	

從手提箱起家的一個黑市市場	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 帕克斯	66
莫斯科人喜歡日本貨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駐莫斯科記者 齋 藤	69
狗市		72
克里姆林宮庇蔭下的賣淫	法國《記錄周報》	75
一句話賣一個盧布	美國《時代》周刊	79

沒落階級的文化教育

蘇聯有文化部，但沒有文化	日本《東京新聞》前駐莫斯科記者 高橋正	89
蘇聯大學生	英國《蘇聯問題研究》 默文·馬修斯	93
世界之冠的社會保險的表裏	日本《東京新聞》前駐莫斯科記者 高橋正	97
現代蘇聯“年青一代”的生活狀態	日本《自由新報》	102
莫斯科的青年也感到厭倦（全文）		
	日本《每日新聞》駐莫斯科記者 江 川	106
蘇聯浸禮教徒的生活	紐約《新俄羅斯言論報》 羅日杰斯特	109
騙子們販賣死去的英雄（全文）	英國《泰晤士報》	113

附錄

俄國人的酒和小笑話	日本《東京新聞》前駐莫斯科記者 高橋正	119
啊，汽車	蘇聯《哈薩克真理報》 加爾庫沙	123

兩極分化的蘇聯社會

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摘要）

西班牙《消息報》 法爾加斯

衆所周知，俄國不能滿足其各民族的糧食需求。當氣候不好的時候，差不多每兩年或三年一次，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要勒緊腰帶。於是，俄國在美國和加拿大市場上購了大批糧食。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它買過好幾次糧食，幾乎達三千萬噸，差不多等於美國收穫量的三分之一。另外，應該提起的是，世界上地面最廣大的國家，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五歸集體種植，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俄國並不能滿足其國民糧食的需求。其餘的可耕地基本上歸私人佔有和歸於市場經濟。但是，景況是壯觀的：百分之六十五的蔬菜、百分之三十四的肉類、百分之四十六的牛奶、百分之五十四的蛋類，總之，百分之三十二的純農產品和百分之四十五的畜牧產品是在這極小的面積上獲得的，這小塊面積只佔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一點五。我們可以說，這塊土地的利用方式完全是西方式的。

從上述事實可以推斷，中央的計劃經濟並不是那麼有效。此外，如果認為只有農業才會產生這種情況，那就錯了。遠的不說，西方報紙最近宣傳，在蘇聯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中（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度），清楚地規劃了它的目標：首先在工業化方面，

要依靠“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和合作。

生產上的不治之症不可避免地影響着消費。從西方的一家雜誌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一個市民的住房面積只等於西方發達國家市民居住面積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五十的蘇聯居民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單獨的衛生設施。在莫斯科郊區，人們只能從公用的水井中打水；在大學中上學的，每八個學生中才有一名農民的兒子，與此同時，每十個在大城市工作的政府官員的子女中就有八名可以保證受到高等教育。”

十分明顯的是，處於極端貧困的蘇聯農民還要資助國家的工業化；產業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一些，黨的官僚政治機構中官員的生活水平最高。令人傷心的是，工業無產者剝削農業無產者，更壞的是，國家官僚政治集團毫無慈悲地剝削前者也剝削後者。

從一九七二年的情況來看，收入多的是：黨的官員，每月四百盧布至一千多盧布；教授和研究機關的負責人，每月三百至七百盧布；官方報紙的主編，每月五百盧布；大企業的負責人，每月五百多盧布；蘇聯一個元帥，每月二千多盧布。但這只是基本的數字和表面現象。在這些情況的背後隱藏着真實的東西，即收入方面的差別是非常大的，遠遠超過上述數字。

在俄國，最高的工資已超過平均工資的十倍至十五倍，或者說已超過最低工資的十五至二十五倍，這是衆所周知的。我們認為，蘇聯社會本身一些特點就助長了工資的懸殊，並擴大了這種經濟差別。在城市或鄉村中房屋的所有權對某些人來說是相當容易得到的。在銀行有巨額存款和買大量公債的人是惹人注意的，但這只是相對而言。在一些村鎮，小汽車並不是罕見的，私人有一艘高級游艇也不足大驚小怪。我們沒有忘記，勃列日涅夫先生

搜集小汽車，以作珍藏品，其中多數是美製汽車。

儘管如此，從這方面來看，當然整個俄國享有特權的人在獲利上還不能同美國一些更富有的人相比。但是，我們認爲，至少可以在它本國有錢的人中相比。首先，我們可以說，這些特權人物手中都有一筆巨款，不叫他們富翁，但可以稱他們是很有錢的人。蘇聯黨的政治官僚們好像時時念及怎麼獲得利益。不管怎麼說，有利於所有特權人物的收入的兩極分化愈來愈大。在“額外津貼”收入中，至少每年多領一個月的工資，並且有實行多種職業的可能性，以便拿雙倍的工資。另一條路子就是，這些有特權的人爲自己的夫人找高官顯職，或者光拿工資不幹事。另一種方式是拿很使人垂涎的“克里姆林宮的津貼”，因爲可以領到金盧布和可以到外匯商店購買進口的高級商品。

我在一個名叫羅斯托夫的城市（八十萬人口）住了一年，這裏一直買不到肉類，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使人痛苦。在這種條件下，只能保證重要人物的一些定量供應。隨着時間的推移，供應有點變化，但是今天又組織所謂“特殊分配”，只賣給一些有地位的政界人士，最多也就是一千來人，他們每人有一張特殊供應的卡片。在這些“特殊分配”點出售一等國產商品和西方的商品。價格實際上是象徵性的。另外的供應渠道是，組織“受限制的出售點”，這種售貨點比前者多，但是，買東西同樣要出示專卡。這裏不出售進口商品，但是，商品的質量比在一般商店看到的要高，其價格可能也低百分之五十。還有“小白樺樹”商店，這裏出售各種進口的消費品——耐用的或易消耗的，價格相當於西方世界的半價。例如衣服，只等於蘇聯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外國人可以進出這種商店，有盧布兌換外匯證件的俄國人，如外交人員及其家屬

和有金盧布的人也可以出入上述商店。此外，我們當然不應忘記一般的市場，這種市場的價格很高，商品質量低。

在消費品的供應上高低不平，在療養方面差別也很大。蘇聯的官員每年有三百盧布的療養費、專門的醫生護理、舒適的住房、免費乘車和文化娛樂等。

據說，在這個國家，享有特權的高級官員有二十五萬來人，其中包括他們的家屬。在這些人中，一直擔任黨的工作的高級官員佔百分之三十八；擔任國家重要職務的官員佔百分之二十四；高級專家、教授、記者和藝術家佔百分之十七；企業的高級負責人佔百分之九；軍、警高級軍官和外交家佔百分之十二。

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推斷，在俄國，資本私人積累低於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在由工資收入派生出來的消費方面，差距是相當大的，這遠遠超過了美國。最嚴重的是，這些差距導致兩極分化，窮的很窮，富的相當富，而且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

另外，無可爭論的是，蘇聯的領導階級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竊用了形式上的民主，而蘇聯人民只有一點個人自由。我們現在要回憶一下，據馬克思主義認爲，資本家積累金錢，首先是爲了大肆揮霍，其次是爲了壟斷權勢和指揮權（有權勢的先生就是有錢的先生），因此得出結論，在蘇聯今天的情況是很類似的。我們已經看到，在直接和間接收入中的差別已足夠保障富人在消費方面的最高優勢。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

特權階層的棲息之所（摘要）

英國《金融時報》

勃列日涅夫掙多少錢？可能一月九百盧布，按官方兌換率約合五百五十英鎊。但是他掙的錢比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少得多。格列奇科是一個蘇聯元帥，據信一月掙兩千盧布（一千二百英鎊）。

但是，除了蘇共黨內的會計和一些密友之外，誰也不確切知道。俄國人小心翼翼地把他們當中的一個上層的存在掩蓋起來。事實上，在所有有關蘇聯社會的談論中，上層這個字眼是禁止說出口的。但是對這個階層的存在沒有人再懷疑了。問題是，這個階層有多大？它有些什麼特權？

俄國的審查官禁止人們提到一月超過四百盧布（二百五十英鎊）的薪水，這樣就很方便地提供了關於上層收入多少的最高限額。四百盧布這個數字為蘇聯普通工資的三倍，為最低工資的近六倍。但是非官方的消息的確泄露出來了。薩里大學蘇聯問題專家默文·馬修斯博士目前正在收集這種消息。他的頭幾批研究材料已於最近公佈。

他認為，在勃列日涅夫之下的黨高級官員，如中央委員會書記一月掙四百八十英鎊，共和國書記一月約三百六十英鎊。學術界高級人員，如研究所所長的基本工資約四百八十英鎊。科學院

院士一月有二百四十英鎊的外快。據信大使的月薪為二百四十英鎊。他們得到的是購買力比盧布大的外匯。共和國報紙的編輯的月薪一月大約為三百英鎊。還有像版稅這種外快。

但是，馬修斯指出，對上層來說，高薪並不是主要報酬，而遠為貴重得多的是上層所享有的特權。首先是，上層拿到的是“金盧布”，他們用這種錢可在特種商店裏購貨。特種商店裏有進口的奢侈品和普通商店裏買不到的優質商品。黨和政府裏的許多人得到所謂“克里姆林宮配給品”。據信有幾千個家庭受惠。

像《真理報》這種受寵的組織甚至在報館裏也有這種商店。

其次，上層可享受特殊的假期便利條件和休養所，黨的高級官員可以得到價值多達三百盧布的免費券，他們的家屬可以享受大打折扣的優惠。衛生部還辦有特別醫療服務，條件好，不必排長隊，雖然，奇怪的是，任何蘇聯公民可以在特種“付錢綜合診所”內由私人醫生看病，單在莫斯科就有九個這樣的診所。此外，上層還可保證得到較好的住房、一輛小汽車（特別受寵的人還有司機），別墅、戲票、進好的學校，還有通向更高一層的門路。

一個人怎麼進入上層呢？光有黨證是不夠的，雖然黨證是從梯子上往上爬的有用的第一步。馬修斯認為，構成上層的基礎的是大約九萬五千名黨的官員，和大約六萬名國家、共青團和工會的官員。然後是知識界的大約五萬三千名院士、醫生、律師、記者和藝術家。其餘的則是高級企業界人士和農學家、軍人、外交官以及克格勃（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後者按其性質來說，就是享有特權的，並且還有權勢。

總共有大約二十五萬五千人，即每一千名蘇聯公民中就有一個上層分子，由於上層的大部分拿薪水者還要養家，因此享受好

處的人就更多得多了。

另一方面，由於大部份俄國人掙的錢是差不多相同的，高工資就益發顯眼。如果你像倫敦經濟學校的彼得·懷爾斯教授所做的那樣，把高級人士的收入同普通人的收入作一番比較的話，就出現了一幅不同的圖景。據他的計算，這使得蘇聯上層分子同普通人相比的情況比英國上層分子同英國普通人相比的情況要好得多。

蘇聯上層分子的大多數子女上的是同樣的一些學校，這就佈下了一個同學網，這是上層分子那種強烈的自衛本能所鼓勵的。蘇聯政權繼續不發生政治動亂的時間越長，上層分子大概將變得越加強大。

已經有一些跡象表明，上層分子的地位在傳繼下去。已經記錄到一些事例，表明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權利，在專門的商店裏買東西。還有，遺產稅很低——只有百分之十——也使積累了財富的任何家庭很容易傳下去，這在那些能確保政治上長期走運的家庭來看，是手中的一個強有力的武器。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蘇聯領導人設法體面地退休。如果勃列日涅夫先生像人們現在廣泛地預料的那樣選擇在一九七六年下次黨代會時下台，情況會怎樣呢？除非他因而失寵，否則他的家庭仍將有機會在他死後很長時間內享受他的榮華的恩惠，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其他家庭也會那樣。他們可能提供未來的上層階層的一個強大的核心。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

在俄國一些人勝過另一些人（摘要）

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駐莫斯科分社社長
詹姆斯·華萊士

蘇聯憲法明文規定：俄國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但是，在這個共產主義腹地，有一個人數越來越多的階級，它正在明顯可見地擴大它自己同俄國大眾之間的鴻溝。

卡爾·馬克思說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俄國的權貴們——並不總是嚴格按其“能力”而高升——却能購買其他人買不起的奢侈品，得到特殊的醫療，到國外旅行。總之，吃、穿、生活都比絕大多數蘇聯老百姓要好。

某些俄國人的生活比僅够維持溫飽的工人要高得多，不僅吃得好得多，而且購買高級食品花的錢也少。

正是這些人享有得到很高獎賞的正式權利——或非正式特權——去特殊商店買東西。這些稱之為“白樺樹”的商店，名義上是專為住在蘇聯的使用硬通貨國家的那些外國人開設的。

莫斯科有幾十家這樣的商店，它們出售食品、服裝、家具、小汽車、各種器械、珠寶手飾、鞋和其他消費品。有些商品是進口的，有些本國商品比大多數蘇聯商店裏的商品質量要高。

也有“特殊的”俄國人。照理說，這些商店是外貿部為照顧外

交官、旅遊者或持有硬通貨的僑民開設的。價錢特別低。

實際上，俄國人的特權階級也在“白樺樹”商店買東西，他們買的稀缺商品花的錢比他們鄰居買的往往是質量要差的商品花的錢要少。一瓶中等伏特加酒在特殊商店裏賣二點三二美元，而在普通商店裏則要貴三、四倍。

政府高級官員、高級軍官以及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都因工作關係而享有在這些商店購買東西這種小額優惠。

不僅如此，權貴階級中的俄國人在諸如弄戲票、在名勝地方的膳宿、預定旅館房間和交通工具票、住房和醫療等等五花八門的事情上也享有優先權。

還有為這些權貴們專門設立的服務行業和修理店，雖然大多數店舖只有從門上掛的一塊小小的招牌才能辨認出來，某些店舖——包括甚至在“白樺樹”商店也買不到的儲存進口精緻品的商店——在外面根本沒有招牌。

莫斯科的戲票和芭蕾舞票幾乎總是出售一空，這是在一個公共文娛生活遠遠滿足不了人們的需求的國家可以預見到的情況。每天演出開始直到第一幕結束時，總有一些好座位空着。這些座位是為黨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最後一分鐘需求保留的。

除黨的高級官員外——他們幾乎總是自然而然地得到最好的東西——通常在共產黨俄國取得成功的辦法和方法往往同資本主義西方的方法相差無幾。

要是家庭有權有勢，這對於進入最好的學校大有好處，在弄到一份好差事方面，認識人可能同你了解情況一樣重要。一份厚禮，有時是明目張膽的行賄，可能有助於把某人的名字排在希望得到較大的寓所，或者一輛新汽車的人的名單前面。

在蘇聯，發跡並不意味着職業和工資步步上升。往往看一個人的提升，不那麼看他的工資增加多少，而是看這種提升為他提供的特權有多少。這些特權——除買東西享有特權外——包括到國外旅行，保證在喜愛的療養地得到保留名額，優先得到新房子。

有世襲制度嗎？家庭有權有勢就可以進好學校，就可以找到好工作，進而得到好房子，旅行多和其他優待。

某些密切注視蘇聯事務的人說，新的世襲制已開始發展了。第二代大學生就是在他們父親上的那些高質量學校裏上學的，然後就得到類似的工作，甚至搬進同一幢公寓。

社會科學家們說，出現一種日益增長的趨勢：好學校的畢業生都同他們自己那個圈子裏的人結婚。

這個無階級社會的權貴階級有多大呢？誰也不確實知道，因為階級特權的程度，甚至這個階級的存在，是蘇聯很忌諱的一個問題。

英國研究者認為，這個階級中有職業者在蘇聯二億五千萬左右人口中約有二十五萬五千人。在這些權貴們中最大的獨一無二的集團是由共產黨的高級官員組成的，他們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

然而，蘇聯特權階級既得利益者的實際人數還要大得多，因為，在多數情況下，一個人的所有直系親屬都可以得到這些好處，如果加上這個數字的話，那麼蘇聯全國就有一百萬或者更多的人比“平等的”千百萬廣大羣衆“更勝一籌”。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